

胡爱祥. 传统产业如何“破茧重生”:江苏蚕桑业典型模式的历史经验启示[J]. 江苏农业科学, 2024, 52(23): 276–282.

doi:10.15889/j.issn.1002-1302.2024.23.036

传统产业如何“破茧重生”:江苏蚕桑业典型模式的历史经验启示

胡爱祥

(江苏科技大学, 江苏镇江 212100)

摘要:可推广的典型模式对于我国蚕桑业的全面发展具有方向性意义。以江苏蚕桑业典型模式“富安模式”“民星模式”及“鑫缘模式”的历史经验启示为例,梳理总结了三大典型模式可复制的共性和可借鉴的特性。三大典型模式可复制的共性经验启示有:构建了依托龙头企业、蚕业合作社、蚕农以及工厂等在内的利益联盟,龙头企业承担引领作用,蚕业合作社承担联结作用,蚕农承担基础作用,工厂承担增值作用。提出的政策建议与意见包括:一是勇于创新蚕桑业发展机制,博采众长,努力形成可借鉴推广的蚕桑发展模式;二是契合社会经济发展特点,因地制宜,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蚕桑发展模式;三是推进蚕桑全产业链融合发展,齐头并进,不断提升质量效益和市场竞争力。本研究有利于为江苏乃至全国蚕桑业政策的动态调整与不断完善提供先进样本参考,促进传统产业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蚕桑业;富安模式;民星模式;鑫缘模式;传统产业;江苏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1302(2024)23-0276-06

2024 年 3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他所在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传统产业在经济稳定性、技术传承、市场需求和文化遗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应充分重视和发挥传统产业的优势。

蚕桑业起源于我国,至今已有 5 000 多年的历史,栽桑养蚕是中国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蚕桑生产是一个连续的复杂过程,包括栽桑、养蚕、制种、蚕茧收烘等不同性质的作业,涉及种植业(栽桑为植物生产)、养殖业(养蚕、制种为动物生产)的知识和技术,蚕桑业是我国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传统产业。

江苏是我国桑蚕丝绸原始发源地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江苏蚕桑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虽然进入 21 世

纪后商务部实施的“东桑西移”工程使江苏蚕桑业面临新的挑战,但仍涌现出了一大批高额丰产典型的先进集体以及可供全国借鉴与推广的发展模式。分析江苏蚕桑业典型模式的历史经验启示,有助于后发地区汲取典型模式的长处,并结合其资源禀赋予以创新以形成适合自身发展的模式,进而齐心协力促进传统产业“破茧重生”,推动江苏乃至全国蚕桑业的高质量发展。

1 江苏蚕桑业三大典型模式的概况

1.1 茧丝绸产业一体化发展的“富安模式”

江苏东台市富安镇是我国最大的优质蚕桑生产基地,被称为“中国茧都”。富安镇将蚕桑业作为地方主导产业,依托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江苏富安茧丝绸股份有限公司,构建了联结蚕农和企业的中间桥梁——东台市安蚕业专业合作社,走出了一条“公司+合作社+农户”的茧丝绸农业产业化发展道路,被称为“富安模式”。

从“富安模式”的发展历程看,1985—1997 年为起步建设阶段,1998—2015 年是快速发展阶段,2016—2021 年进入平稳巩固阶段。进入“十三五”后,富安蚕桑业迎来平稳发展期。就龙头企业而言,江苏富安茧丝绸股份公司在组织生产、科技研发以及体制创新等方面持续探索:2015 年,与中国

收稿日期:2024-06-10

基金项目:江苏省科技项目政策引导类计划—软科学研究(编号:BR2021032);江苏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重大课题(编号:JGKT23_A015);江苏省高等教育教改研究立项课题(编号:2023JSJG258);江苏省学校美育科研规划立项课题(编号:202300027);长三角高水平行业特色型大学联盟专项重点课题(编号:CSJZD202307)。

作者简介:胡爱祥(1978—),男,湖北监利人,博士,副研究员,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和中国近现代史等方面的研究。E-mail: huaixiang@just.edu.cn。

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江苏苏豪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签署“超 6A 级生丝抗性蚕品种的选育”合作协议,开启超 6A 级生丝抗性蚕品种的选育及产业化新征程,2017 年,超 6A 级生丝抗性蚕品种“苏超二号”顺利取得江苏省品种审定证书;2017 年,富安茧丝绸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项目被列入中央财政支持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试点项目,获得中央财政支持资金 1 000 万元,主要用于蚕业生产技术集成创新推广(一产)、茧丝绸深加工扩能升级(二产)和茧丝绸生态旅游资源开发(三产);2018—2020 年,积极推进商务部规模化集约化蚕桑基地建设项目的实施,3 年共获得商务部专项资金 600 万元,有力提升了富安规模化集约化蚕桑基地建设水平。龙头企业的探索,进一步提升了富安茧丝绸产业发展整体水平,扩大了富安茧丝绸对外影响力,为打造茧丝特色小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就农民合作社而言,2015 年 12 月,富安蚕业专业合作社被原国家农业部认定为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2018 年 6 月,又被国家农业农村部等九部委联合监测审定为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就蚕农而言,在龙头公司的指导下,与合作社签订生产、收购合同,稳定的市场和收入预期,从源头保证了富安蚕桑业的原料供给。

在“公司+合作社+农户”共同协作的基础上,富安从 2017 年开始,蚕农的桑收益超过

15 万元/hm²,超过市场平均水平 35%。同时,江苏富安茧丝绸股份有限公司资料显示,其还推出“三次奖补”措施,在“二次分配”基础上,再从企业加工增值和出口创汇的红利中拿出部分资金,按蚕农售茧数量实行蚕药、蚕具等蚕用物资奖补,总额超过 900 万元,有效保障了蚕农收益的高质与稳定,极大激发了蚕农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蚕桑业技术革新,保证了蚕桑业基本盘的长期稳定。

2017 年后,随着“东桑西移”工程的加快推进,江苏蚕桑业规模持续萎缩,富安在这一潮流中也未能独善其身,桑园面积、发种张数、产茧量以及总产值都有下降趋势,如表 1 所示。如何保持老牌富民产业优势,实现蚕桑业的“破茧重生”成为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因此,富安选择走高端产品路线,聚焦 6A 高等级生丝的生产,通过质量的提升来掌控高端市场定价权,弥补总产量的下降,保证单位产值的稳固。目前,富安蚕茧超过 80% 可以用作缫制 6A 级高等级生丝,是我国唯一能够常年批量生产 6A 级高等级生丝的主产地,占据国际高端生丝市场 40% 以上的份额,与爱马仕、香奈儿等全球奢侈品达成了合作协议,是美国强生医用缝合线的唯一指定原料供应商,获得了高端市场的定价权。“富安模式”三驾马车中的富安蚕业专业合作社更是在 2020 年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发展指数中雄踞我国第 11 位^[1],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表 1 富安镇蚕桑生产情况(2016—2022 年)

年份	桑园面积 (hm ²)	养蚕数量 (张)	产茧量 (t)	总产值 (万元)	从业人员 (人)
2016		111 296	3 591.90	17 208.62	
2017		110 787	3 712.70	20 633.58	
2018		112 026	3 679.05	20 264.89	
2019	1 763.40	107 084	3 417.65	16 614.33	
2020	1 680.67	93 471	2 836.75	11 858.13	15 431
2021	1 510.67	77 238	2 353.60	14 574.40	15 431
2022	1 340.00	64 605	1 931.55	11 393.93	

注:表中数据根据江苏富安茧丝绸股份有限公司数据整理。

1.2 聚焦蚕业合作联合社的“民星模式”

江苏民星茧丝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星公司)位于江苏省东台市,在成立之初面临 2 600 万元债务的困境下,通过成立东台市民星蚕业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吸收了全市大多数蚕农以及茧丝绸加工企业,形成了牢固的“公司+蚕业合作社+工厂+农户”产业化发展路径,不仅对东台市的蚕桑

业产生了重要影响,还通过建立我国首个跨市级蚕业合作联合社,推动整个江苏蚕桑业的共赢发展,被称为“民星模式”。

就“民星模式”发展历程而言,1999—2002 年是起步建设阶段,2002—2015 年为快速发展阶段,2016—2021 年是平稳巩固阶段。进入 2016 年后,民星公司开始围绕蚕业合作联合社,巩固前期发展

成果。2016 年 2 月 3 日,国务院下发《关于第二批取消 152 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国发〔2016〕9 号),蚕茧收购正式退出行政许可管理。东台市作为我国蚕茧主产区之一,面临着各地茧贩的轮番冲击^[2],而以蚕茧收烘作为主营业务之一的民星公司以蚕业合作联合社为纽带,将绝大多数的东台蚕茧留在了东台为本地加工企业所用。在进入蚕茧交售期时,民星公司组织联合社成员定点调研外来茧贩收购价格,掌握市场动态;在蚕茧开秤前晚,组织所有入社加工企业,一起讨论当季收购价格;开秤后迅速在最短时间内将市场上几乎所有蚕茧收购完毕。通过“前期充分调研、中期仔细论证、后期效率抢收”,保证了东台茧丝绸全产业链原料的稳定。在这一过程中,民星公司、加工企业以及蚕农真正将自身看成了利益共同体:具有收购能力的加工企业不因小利脱离组织;拥有蚕茧出售自主权的蚕农充分信任民星公司,在不开秤前,绝不售卖;民星公司承诺在蚕农售茧后以现金方式兑现茧款。正是以蚕业联合社为基础的多方信任,才使得东台蚕茧收购率高达 95% 以上。

在保证蚕茧收购秩序的基础上,民星公司继续围绕蚕业合作联合社,探索推进蚕茧量质齐升的方法。一是,民星公司仍然坚持保护价收购蚕茧,并对正规渠道订购蚕种的优质蚕茧实行二次分配循环奖励,2016—2020 年 5 年间,累计返利和补价给蚕农 6 000 多万元。蚕农 1 hm² 桑收入超过 12 万元,户均收入 1.2 万元。二是,对缫丝企业积极让利拉动。公司对区域内 8 个丝厂采用“茧本加费用”办法供应蚕茧,近 5 年间,由公司供应给丝厂的蚕茧价格与市场价相比累计让利给加工企业 8 000 多万元,调动了加工企业的热情。三是,加强“八统一”服务力度,每年投入 300 多万元组织 380 多人组成服务队,常年登门到户为蚕农开展产前、产中、产后全程服务。四是,依托公司所属蚕茧站等,构建了约 40 个科技超市便利店,提供栽桑养蚕物资,并通过设立电子屏以及摄像头,便于蚕农与蚕学专家进行视频面对面服务,同时积极利用 QQ、微信以及“农业直通车”等网络平台为蚕农及时发送技术短信,进行远程咨询服务、培训,加强为农服务的信息化。

随着东台市民星专业合作社的不断壮大,其在国内的知名度与日俱增,在 2020 年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发展指数中雄踞我国首位^[1],在 2022 中国农

民合作社 500 强中位居我国第 2^[3],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第四次检测合格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1.3 茧丝绸全产业链发展的“鑫缘模式”

“鑫缘模式”是鑫缘茧丝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缘集团)在蚕桑领域的成功探索。与“富安模式”与“民星模式”不同,“鑫缘模式”将科研院所纳入其发展体系,形成了“公司+基地+农户+工厂+科研院所”的茧丝绸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并在 2017 年得到商务部的全国推广,在江苏、广西、江西等地区成功复制,并在海外越南成功扎根,得到了江苏、浙江、安徽、江西以及上海市场监管局的联合表彰。

“鑫缘模式”的发展历程可分为 3 个阶段,一是起步建设阶段(1994—2002 年),二是快速发展阶段(2002—2013 年),三是高质量发展阶段(2014—2021 年)。随着“东桑西移”战略以及江苏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加快推进,海安蚕桑业也面临巨大冲击,传统“公司+基地+农户+工厂+科研院所”的利益联结模式日趋脆弱,桑园面积、饲养张数以及蚕茧产量从 2014 年开始不断下滑(表 2),整个海安市蚕桑业发展后劲不足。面对宏观形势的不利局面,作为海安蚕桑业的龙头企业,鑫缘集团抓住国家关于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政策的契机,适时提出“建场+组社+联农”发展理念,其中:“建场”是指依托土地经营权流转,加快发展规模化、标准化与集约化的蚕桑家庭农场;“组社”是指参考以往合作社经验,组建以蚕桑家庭农场为核心的新型蚕业合作社;“联农”是指以蚕业合作社为核心,联结并组织分散蚕农按照特定栽桑养蚕技术要求进行标准化生产。

表 2 海安蚕桑生产情况(2004—2022 年)

年份	桑园面积 (hm ²)	饲养张数 (张)	蚕茧产量 (t)	蚕茧产值 (万元)
2014	6 358.67	295 911	10 697.18	47 281.55
2015	5 754.27	227 771	9 099.45	33 758.96
2016	5 651.60	189 334	7 599.87	40 507.29
2017	4 752.40	191 679	7 734.25	43 157.10
2018	4 751.40	174 536	6 004.04	33 046.23
2019	4 372.60	176 528	7 122.90	35 685.75
2020	4 171.35	131 019	5 265.91	21 551.89
2021	3 815.50	103 605	4 148.41	23 803.96
2022	3 563.72	109 000	4 247.00	24 000.00

注:表中数据根据鑫缘茧丝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数据整理。

为了保证蚕业家庭农场建设质量,鑫缘集团提出了 5 项建设原则:一是符合镇村农田规划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长远规划;二是结合镇村栽桑养蚕基础,将任务有重点、有计划地分解落实到村级单位;三是农场地势要高,排水方便,土质较好;四是远离工业集中区以及集镇,且附近不能有污染源;五是占地规模以 $3.33 \sim 6.67 \text{ hm}^2$ 为主。通过“建场+组社+联农”,栽桑养蚕大户获得了连片土地,或自建、或与鑫缘集团合作建设蚕桑家庭农场,在规模化、标准化与集约化栽桑养蚕的同时,开拓桑园内养鸡等复合型农业经营,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提高经济效益。这些农场大多数都领取了工商营业执照,成为新型蚕业经营主体。通过规模化经营,农场传统桑收益达到 12 万元/hm^2 ,加之复合经营,收益超过 22.5 万元/hm^2 ,较以往实现了大幅提升。对于出让土地的农户而言,不仅可以获得 $1.2 \text{ 万} \sim 1.8 \text{ 万元}/(\text{年} \cdot \text{hm}^2)$ 的租金收益,还可在蚕忙季节参与农场劳作,日均收益高达 $60 \sim 150 \text{ 元}$ 。鉴于“建场+组社+联农”的成功,2017 年,商务部专刊《商务参阅》将“一体化带动规模化,推进茧丝绸全产业链发展”的“鑫缘模式”作为典型经验向全国推广^[4]。

在“东桑西移”不可扭转的大背景下,鑫缘集团不局限于在海安发展,而是积极在全国乃至海外布局。在国内,鑫缘集团在江苏泗洪、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和德保县、江西省永新县、安徽省潜山市、霍山县、岳西县以及陕西省略阳县等地,复制推广“公司+科研院所+基地+农户”“建场+组社+联农”模式,带动 30 余万蚕农实现增收,在毛南族整族脱贫中扮演了重要角色^[5]。在海外,鑫缘集团积极布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越南等国建立蚕桑生产基地,充分利用当地丰富劳动力资源以及优质生产环境,拓宽集团在国际市场的发展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鑫缘集团之所以能在江苏蚕桑业日趋衰落的大形势下,顶住压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与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在组织、资金、土地、环保以及市场秩序等方面的支持密切相关。在组织支持上,海安市为了保障蚕桑业发展,每年由市领导牵头组建推进蚕业农场领导小组,通过市、镇、村三级的发动与宣传,鼓励土地流转经营。在资金支持上,2016 年,原农业部将鑫缘集团列为全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领军企业;2018 年,江苏省商务厅对鑫缘集团牵头组建的蚕桑示范基地给予建设资金补助,海安市政府也出台了大量关于规模化生产

的补贴政策。在土地支持上,由海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及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帮助解决规模化生产基地面临的用地规划以及配套设施等问题。在环保支持上,针对近年来流行的水稻无人机喷洒农药等现象,由政府牵头“双防双控”,确保粮田药物使用对桑园无害;对化工等污染较重的行业,如果对栽桑养蚕形成威胁,由政府提前 3 个月下文要求停产。在市场秩序上,海安提出“政府有形的手管秩序、市场无形的手管价格”,在收购季节,组织市场监管、税务、价格、质检等部门联合保障蚕茧收购秩序,在防止外来茧商哄抬茧价的同时,也监督本地企业的“压级压价”行为,保证了海安全域蚕茧收购的良好秩序与质量。

2 江苏蚕桑业三大典型模式的历史经验启示

2.1 可复制的共性经验启示

“富安模式”“民星模式”及“鑫缘模式”三大模式均在某种意义上构建了依托龙头企业、蚕业合作社、蚕农以及工厂等在内的利益联盟,龙头企业承担引领作用,蚕业合作社承担联结作用,蚕农承担基础作用,工厂承担增值作用。

以“富安模式”为例,一是该模式是贸工农一体化时代背景下的改革成果,作为江苏省第一批贸工农一体化改革试点之一,“龙型结构”中的龙头——江苏富安茧丝绸股份公司集生产、加工、销售于一身,该特点不受时间与空间限制,可以被其他地区和产业所借鉴。

二是始终将蚕农的利益放在首位,通过订单生产、溢价收购、技术支持、“二次分配”以及“三次分配”等方式将企业与蚕农联结成利益共同体,解决了蚕农的后顾之忧,提振了蚕农的生产积极性,保证了富安蚕桑的基本盘。将农民利益放在首位,是所有现代特色农业发展的根本遵循。

三是蚕业专业合作社扮演了联结企业与蚕农的重要中间角色,根据生产经营发展及社员的需要,以社员为主要对象,由龙头企业承担生产过程中的产前、产中、产后系列化服务,并积极搜集茧丝绸市场信息,研究市场行情,及时向社员传达相关信息,这与其他地区与其他产业的合作社存在共同性。

2.2 可借鉴的特色经验启示

2.2.1 “富安模式”的特色经验启示 一是从 1985 年成立富安茧丝绸公司,到 1994 年的江苏富安茧丝

绸集团,再到 1998 年的江苏富安茧丝绸股份有限公司,近 40 年间,富安蚕桑业的领导层基本保持稳定,始终由最初创始人执掌,在统一领导下,各类政策才得到了有效执行。而反观国内大量早期成功但后期陷入困境的发展模式,大多都存在领导权分散,导致内耗严重,不利于可持续稳定发展。

二是茧丝绸行业是一个极具特殊性的行业,栽桑养蚕对气候、土壤等条件非常敏感,即便已经难以检测到的农药污染也会对蚕茧质量造成巨大影响,影响后续的生丝质量。因此,蚕桑发达的地区,必然是生态优质地区。富安在发展蚕桑业的同时,也不断加强生态保护,实现了产业与生态并重发展。

三是蚕桑丝绸产业作为新中国成立后近 50 年出口创汇支柱产业,成为了我国的功勋产业,因其重要性,曾面临多头管理、各自为政的不利局面,生产、加工、销售、外贸等归属不同部门,相比于其他产业更加复杂。“富安模式”抓住贸工农一体化的契机,彻底解决了上述局面,并且成为目前江苏唯一成功延续至今的一体化试点。

四是“富安模式”充分利用农村留守劳动力,目前富安蚕农年龄区间大多集中在 60~75 岁之间,平均年龄高达 68 岁,这些老蚕农仍然坚守自己一辈子的养蚕事业,龙头公司并没有抛弃这些将一生奉献给蚕桑业的老年群体,仍然将其作为蚕桑事业主力军,每年为这类群体提供的桑综合收益超过 15 万元/hm²。

五是坚持走高端路线。与其他蚕桑主产区注重数量不同,富安主要聚焦高端市场,主打 6A 级高等级生丝,“FUAN”蚕茧与生丝获得了知名品牌的溢出效益,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单位产值的稳定增长。

2.2.2 “民星模式”的特色经验启示 一是以服务三农为宗旨。民星公司尽管是一个贸工农一体化企业,但其主营业务中最重要的是蚕茧收烘,其发展与蚕农息息相关。民星公司始终将蚕桑生产作为茧丝绸行业的“第一车间”,通过订单生产、保护价收购、二次返利以及循环分配等政策,从资金层面予以蚕农支持;通过“万人培训”、教育科普以及现场指导等方式,从科技层面予以蚕农支持。这些措施都极大提升了蚕农的栽桑养蚕积极性,以及对蚕业合作社的归属感。

二是以蚕业合作社为载体。依托蚕业合作社,民星公司在 2 个方面实现了创新:一是构建了“党组织+合作社”的发展模式,推动合作社规范化与

制度化,通过党建将农技党员以及村党员干部组织起来与蚕农“联姻”,针对性指导帮扶。二是构建了“八统一”的社会化服务模式,一方面使得蚕农技术不用愁、卖茧不用愁、收益不用愁,另一方面使得后道加工企业原料数量稳定、质量有保证。

三是以科技创新为动力。民星公司与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江苏科技大学以及苏州大学等建成产学研合作联盟和国家级试验示范基地,先后投入 8 200 多万元用于创新和技术开发,组织实施了省厅级科技项目 30 多个,取得科技成果 30 多项,特别是成立了省级 6A 级蚕丝综合技术开发工程中心,使得茧丝质量、桑效益名列全国前茅。这些技术的创新为蚕桑业老龄化背景下蚕农的降本增收提供了极大支撑。

2.2.3 “鑫缘模式”的特色经验启示 一是地方政府提供保障。海安市政府始终顺势而变,将蚕桑业作为全市支柱产业,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出台不同措施保驾护航。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工业立市”背景下提出建立蚕桑产业片区,将其蚕桑产区布局调整到远离工业园区的边缘乡镇,保住了蚕桑业发展的基本盘。在 2010 年欧美金融危机爆发严重削弱国际市场丝绸消费能力导致我国蚕桑业面临严重挑战时,由政府牵头启动家庭产业化经营,并由市人大决议保证桑园规模不低于 3 333 hm²,确保蚕桑业发展基础。为稳定全市蚕茧收烘秩序,每年发布加强蚕茧收烘秩序管理通告,确保鑫缘集团支持生产出的蚕茧不被不良茧贩抬价收购或压级压价。政府提供的制度、政策与资金上的保障,为鑫缘集团及全市蚕桑丝绸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二是以龙头企业为核心。从“公司+农户+工厂”到“公司+基地+农户+工厂+科研院所”,再到“建场+组社+联农”,在发展模式的不断演化与转型升级中,鑫缘集团始终处于核心地位:(1)与蚕农签订长期合同,以收购保护价、科技服务以及补贴奖励等提升蚕农栽桑养蚕积极性;(2)牵头推进桑园基地建设,为规模化、集约化以及标准化栽桑养蚕提供载体,不断提升桑产量和蚕茧质量;(3)设立后道产业链生产子公司,通过制定经营目标以及考核细则等制度进行总体管控,进一步提升公司发展质量;(4)积极与高校和科研院所进行深度合作,牵头项目攻关,推进产学研用融合,实现创新发展;(5)针对新型蚕业家庭农场,一方面制定“五统一”

(统一订购蚕种、统一技术规范、统一饲养要求、统一茧质标准、统一拣茧约期交售)管理机制,另一方面针对符合签约合同量质要求的农场进行现金补助与额外补贴。通过上述方式,鑫缘集团推动形成了全产业链利益共同体,保证了“鑫缘模式”的稳定。

三是延伸拓展产业链。从事单一蚕茧收烘业务受市场制约较大,即便是成熟的“富安模式”以及“民星模式”,在“蚕茧大战”中都遇到了暂时困境。鑫缘集团从 2000 年就开始转换经营思路,确立茧丝绸产业链前延后伸的发展路径,在确保蚕茧收烘盈利能力的同时,将重点置于丝绸深加工以及文化创意等项目,提升公司发展水平。不仅如此,鑫缘集团还挖掘桑蚕茧丝副产物的增值潜力,开发了桑叶茶、蚕蛹油以及护肤品等产品,实现了茧丝绸全产业链的开发。

四是积极推动品牌建设。鑫缘集团高度重视品牌管理工作:在商标管理上,在中国、美国、日本以及韩国等国家都注册了“鑫缘”商标,形成了国内与国际的统一,保证商标专用权不受侵犯;在品牌宣传上,在中国丝绸博览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以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各类场合积极宣传“鑫缘”品牌^[6],并通过媒体、网站等提升品牌知名度;在品牌质量上,通过领先的产品质量以及完善的品牌培育体系,不断提升品牌含金量。通过统一品牌,使得集团各类产品都能获得“鑫缘”品牌效应的加成,提升了全产业链产品竞争力。

3 借鉴及建议

3.1 勇于创新蚕桑业发展机制,博采众长,努力形成可借鉴推广的蚕桑发展模式

活跃的机制创新是蚕桑业发展的内生动力,成熟的发展模式对于一个产业的快速壮大具有重要意义,江苏之所以能够在“东桑西移”工程加快推进的背景下保证蚕桑业的持续发展,其一重要原因就在于诞生了大量可借鉴推广的蚕桑发展模式,例如“富安模式”“民星模式”及“鑫缘模式”等。仔细剖析江苏蚕桑业典型发展模式,可以发现既具有大量共性,又存在各自特性。共性主要体现在多数地区都构建了以龙头企业为牵引、以蚕业合作社为纽带、以蚕农作为基础保障、以加工企业作为价值创造的利益联盟,通过紧密的利益关联保证了蚕桑生产的稳定性。特性主要体现在各发展模式不是完全的模仿复制,而是各有特色:“富安模式”以稳定

的领导层保证各类政策能够得到有效执行,依靠“精品发展”获取的丝绸收益反哺蚕桑业稳定发展;“民星模式”不直接参与后道加工,以蚕茧收烘为主营业务,但以地方以及跨市蚕业合作联社的方式将蚕桑业上游和下游紧密联合在一起,推动了江苏蚕桑业的共赢发展;“鑫缘模式”通过一体化带动规模化,实现茧丝绸全产业链发展,对于蚕桑业的做大做强具有方向性意义。

3.2 契合社会经济发展特点,因地制宜,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蚕桑发展模式

“富安模式”“民星模式”及“鑫缘模式”的成功,使得各个后发地区能够通过借鉴吸收这些模式的长处,并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加以创新,形成适合自己的蚕桑发展模式,比如吴江、启东以及射阳等江苏蚕桑主产区,都探索出了适合自身发展的独特模式。当然,江苏蚕桑企业的活跃探索与其经济发展特点是紧密契合的。20 世纪 80 年代初,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动下,江苏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探索出了“一包三改”^[7],即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改干部委任制为聘用制、改职工录用制为合同制、改固定工资制为浮动工资制、“四轮齐转,双轨并进”等发展经验^[8],推动了江苏农村经济的蓬勃发展,形成了广为人知的“苏南模式”^[9],以及苏北的“耿车模式”等^[10]。这些对生产与经营道路的探索精神也深刻影响了江苏蚕桑企业,故而诞生了各具特色的蚕桑发展模式。

3.3 推进蚕桑全产业链融合发展,齐头并进,不断提升质量效益和市场竞争力

蚕桑业是一个包含栽桑、养蚕、收烘、加工等在内的系统性产业,加工环节的增值远高于前道环节,但前道环节又是加工环节不可缺失的重要基础。因此,需要推动蚕桑全产业链融合发展,以市场竞争力的提升强化生产经营风险的防范能力。一要加强产业集群化发展,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头作用,培育壮大一批蚕桑领域的新型经营主体,以蚕桑产业园区、特色小镇为依托,打造重点规模化集约化生产基地,形成蚕桑强镇、强村新格局。二要充分释放典型示范作用,推广地方有益探索,为各地发展蚕桑业提供了先进样本参考,使其能够为各地所借鉴并推广,进而通过各地蚕桑业的齐头并进推动全省蚕桑业的高质量发展。三要深挖蚕桑业的生态、文化以及社会等多种功能,深入推进蚕桑资源的综合利用,可以桑树资源为媒介开拓桑

秦社华,李 泽. 环境规制对农产品加工企业生态效率的影响[J]. 江苏农业科学,2024,52(23):282-287.

doi:10.15889/j.issn.1002-1302.2024.23.037

环境规制对农产品加工企业生态效率的影响

秦社华¹, 李 泽²

(1.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江苏南京 210023; 2. 南京财经大学, 江苏南京 210023)

摘要:为揭示环境规制对于农业企业生态效率的影响,以 2018—2021 年 26 家农产品上市加工企业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 Super-SBM 模型测算农产品加工企业的生态效率,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农产品加工企业生态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强度滞后 1 期在 5% 水平下显著为负,环境规制强度滞后 1 期的二次项在 10% 水平下显著为正。该结果揭示了环境规制强度与农产品加工企业生态效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其对农产品加工企业的生态效率具有显著的“U”形影响。这意味着尽管在短期内环境规制会对农产品加工企业的生态效率产生负面影响,但长期来看,企业的生态效率将逐渐提升并超过起始水平。本研究对农产品加工企业在环境规制下制定调整企业长期发展战略具有一定的启示,企业应积极通过技术改造等手段适应环境规制。

关键词:环境规制;生态效率;农产品加工企业;Super-SBM 模型

中图分类号:F3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1302(2024)23-0282-06

当前,全球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环境挑战日益加剧,农产品生产加工作为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其相关企业的生态效率对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农产品加工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是其快速发展对生态环境造成了诸多不利影响,如废气废水的排放、面源污染等使生态环境遭到了巨大破坏。而生态环境具有公共性和外部性特征,要促使农产品加工企业在追

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兼顾生态环境效益,就需要政府制定环境规制对企业的经济行为进行干预。当前我国的环境规制是否能够有效促进农产品加工企业的生态效率?其作用机制又是什么?对上述问题的研究能够为促进农产品加工企业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改善生态环境提供政策依据。

1 文献综述

1.1 环境规制的相关研究

环境规制属于公共规制的范畴领域,当一个国家出台一项政策或相关环境法律法规时,企业就会

收稿日期:2023-11-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编号:22ZDA117)。

作者简介:秦社华(1971—),女,江苏泰州人,硕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管理研究。E-mail:445755869@qq.com。

园套种模式以及桑叶茶、桑果酒等多种衍生产品,还可通过文化旅游等方面延长蚕桑产业链,推动生产供应链、精深加工链、品牌价值链“三链”同构,促进蚕桑业标准化、科技化、生态化、智能化发展,走“生态型、多元化、高效益、可持续”发展之路,让传统产业“破茧重生”焕发新的生机。

参考文献:

- [1] 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 国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发展指数(2020)研究报告发布 国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发展指数得分排名前 300 名单公布[J]. 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2022(3):59-65.
- [2] 严相顺,王世锁. 东台市蚕桑产业状况分析[J]. 江苏蚕业,2018,40(增刊2):40-42.
- [3] 王 斌. 2022 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 500 强排行榜[N]. 农民日报,

2022-12-28(7).

- [4] 江苏鑫缘茧丝绸股份公司. 鑫缘集团被商务部作为典型经验和模式向全国推广[J]. 江苏蚕业,2017,39(2):45.
- [5] 陆昌存. 精准帮扶常青树 “东桑西移”结硕果 江苏海安市鑫缘茧丝绸集团助力毛南族整族脱贫侧记[J]. 中国民族,2020(6):30-31.
- [6] 陆良英. 鑫缘集团精彩亮相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N]. 消费日报,2021-12-15(B4).
- [7] 申斯春,杜宝吉. “一包三改”:20 世纪 80 年代的堰桥版和正定版[J]. 江苏地方志,2022(6):48-50.
- [8] 张玉宏. 蜚声全国的“耿车模式”[J]. 档案与建设,2013(1):43,61.
- [9] 赵元浩. 发展乡镇企业广东应向江苏学习什么?[J]. 南方经济,1987(5):27-31.
- [10] 胡同恭. 论耿车模式[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1):19-23.